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
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

蘇碩斌**

投稿日期：99年11月6日；通過日期：100年5月25日。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想像的臺灣空間：日治時期的「台灣」概念如何在印刷文學中浮現》（NSC 95-2412-H-128-003）之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建設性的修改意見，以及李廣均、張茂桂、李承機等諸位教授在觀點及資料上的啟發。

** 作者蘇碩斌為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e-mail: sbsu@ym.edu.tw。

《摘要》

本文以活字印刷的媒介作用解釋日治中期「臺灣意識」的發生。基於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概念與麥克魯漢媒介理論，本文藉由分析 1920 至 1930 年代的《臺灣民報》，指出文學作者認知到活字印刷的媒介，改以不特定的讀者大眾為訴求對象，而在報紙文學中設想出臺灣意識。這個臺灣意識始自對抗日本，後漸與中國分離而形成「三百六十萬臺灣人」的明確民族主義邊界。本文以此論證，日治中期的臺灣意識已是具有現代建構論意含的想像共同體。

關鍵詞：民族主義、印刷資本主義、活字印刷、想像共同體、臺灣意識

壹、前言

歐美的民族主義研究在 1980 年代湧現了現代建構論（modernism-constructionism）的思潮，挑戰並顛覆了長期主流的原生本質論（primordialism-essentialism）。這個新思潮不僅造成學術典範轉變，也為各國帶來族群政治的風暴，臺灣亦然。但是現代建構論對臺灣意識出現的解釋射程，本文認為不應只限於 1980 年代之後，而更應往前應用到日本殖民的 1920 及 1930 年代。因此本文試著重新解讀現代建構論的方法基礎，以論證日治時期臺灣已出現醞釀民族主義的社會條件。

所謂現代建構論與原生本質論，是理解民族或族群的兩種最主要理論（Smith, 1986），原生本質論強調民族是基於共享的自然情感展現的古老傳統，現代建構論則認為民族是伴隨現代國家出現的新興產物。¹ 現代建構論的民族主義觀，在理論上打破了過往單一民族國家的表象，也在實踐上灌注了多元政治抗爭的能量。臺灣在 1983 年因為民歌手侯德健轉進中國大陸，挑動社會內部隱忍的族群神經，並掀起「臺灣結／中國結」的認同意識論戰（施正鋒，1999；施敏輝，1988）。這場交織政治與學術的論戰，起初是以文學評論之名進行，看似為 1978 年、1981 年兩波「鄉土文學」論戰的延伸，但是議題內容卻已遠超出兩次論戰的文學範疇，而竟撼動政治認同的禁忌。這個過程仿若現代建構論的本地驗證，因此在學術或政治上都受到高度注目。

以現代建構論的角度來看，臺灣意識雖能撼動「中國意識」這個人為建構的產物，自身也不可避免是人為建構的產物，因此必定也起於某個特定時空。本文主張臺灣意識起於 1920 年代，原因是當時的文學作者對於「作為讀者的同時代人民」有了知識上的新圖像，並以「我們三

百六十萬臺灣人」的方式表現出來。而這種統稱、排外的民族意涵，在過去臺灣歷史從未出現過。

日治中期這個「我們三百六十萬臺灣人」的文學表述，究竟是不是民族主義意含的臺灣意識？若是，又是因為什麼機制發生？正是本文問題意識的起點。本文的理論關懷源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引發民族主義建構的論點，並在方法論上結合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及日本文學理論家前田愛的媒介理論，期能提出解釋臺灣意識形成的分析架構。本文以《臺灣民報》為主要分析材料，論證因 1920 年代活字印刷機制下的文學作者對於可能的讀者產生新的想像，並在論戰中不斷修正這種想像，終至愈漸具體形成「有邊界的想像」，具有民族主義意涵的想像共同體也因而浮現。

貳、臺灣意識何時及如何發生的問題

當代臺灣意識（臺灣認同）的學術研究，多認為 1980 年代臺灣意識是現代國家的建構產物，迥異於清代時期或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概念。因此，一般也都接受清代之前並沒有臺灣族群之意識、也無統稱性臺灣人的概念。

以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如王甫昌（2003，頁 26）所言，清代臺灣各個族裔、政治及文化各自從屬於帝國中國，只有利益衝突爭鬥而產生的福佬（Holo）、客家（Hakka）等籠統性名稱，而沒有指稱所有在臺族群的「整體想像」。這個解釋，大抵與涂照彥（1993，頁 20）理解的經濟史觀相近，亦即乾隆之後全臺稻產區就「個別」納入中國大陸的米穀統制系統，形成各地區內部自足的「區域不相聯屬」的狀態，全

臺既不是單一市場，地區間聯結也就薄弱。

同樣的，清末與日治交替期間的「臺灣民主國」雖曾發布宣言提出「爰經大會議決，臺灣自立」（楊碧川，1997，頁 265），又或丘逢甲（1960，頁 376）也說過「臺灣者，吾臺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雖棄我，我豈可復自棄耶」，但背景都是期望回歸清朝中國的權宜之計，例如丘逢甲在〈臺民布告〉的文脈其實是「臺民惟有自主，……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連橫，1962，頁 93-94），這裡的「臺灣自主」只是手段而非最終目的，「臺人」是依附於「中國人」的從屬性意識，而非獨特的自主性族群概念。²

清末無臺灣意識的設想，大抵也適用日治前期的臺灣。雖然 1920 年代以前中南部反抗運動出現不少獨立運動，例如 1897 年嘉義黃國鎮的太靖皇帝，1912 年土庫黃朝的臺灣國王，1914 年六甲羅臭頭的臺灣皇帝，1915 年西來庵余清芳的大明慈悲國，雖皆以臺灣獨立為目標，但都仿效傳統中華帝國，不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黃昭堂，1970／廖為智譯，2006，頁 244）。再由民俗認知的層次來看，方孝謙（2001）由臺灣殖民早期故事亦論證，清末民眾的認同貼近中國傳統儒釋道混雜的英雄君子認同，無關國族。

綜上，清代或日治前期無臺灣意識的論證大致已有定論，且符合民族主義建構論（如 Ernest Gellner）設定的理論推想：民族主義是現代工業社會出現的結果。原因是社會分工促使人群大量流動而失去傳統共同體意識，因而國家乃崛起成為新的權威，並提供標準化、同質化的普遍教育，而使國家的政治疆界與文化疆界合而為一（Gellner, 1983）。因而 Gellner 才說，並非民族創造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創造了並不存在的民族」（Gellner, 1964, p. 168）。依此邏輯，具有民族主義意涵的臺灣意識也應為現代國家的產物。當代臺灣學界將臺灣意識緊扣「集

體記憶、現代想像」之論述框架，而不將清治或日治前期的臺灣（臺灣人）概念納入討論，大抵符應這個推想。蕭阿勤（1999, 2000, 2002）討論戰後世代將文學之臺灣意識納入認同敘事而展開「民族」再發現過程，王甫昌（2001）以教科書論戰來追溯戰後「中國意識／臺灣意識」的拉扯，及吳介民（2004）以鄉土文學寓含「隱藏文本」概念來說明臺灣意識是公共領域展現的質性，皆以臺灣現代國家框架下的 1970 及 1980 年代二大意識論戰為分析基礎。

但是，如果臺灣真的有民族主義意涵的認同意識，那麼，現代建構論的解釋射程能否向前溯至 1970 年代以前、甚至推到臺灣意識最早可能發生的 1920 年代？本文認為這個理論疑點答案是肯定的。

事實上，前述當代民族主義研究者並不否認臺灣意識有更久遠的歷史，例如王甫昌（2001，頁 159）就說當代中國和臺灣兩種民族論述「都受到先前就存在的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影響」。先前就存在的意識為何？日治中期的 1920 至 1930 年代，亦即發生至少兩次爭取自主文學運動的時代，顯然就是值得探討的時代。雖然日治時期文學運動的史實過程，因為混雜諸多當代族群政治的角力而日愈複雜，而被賦予更多層次的文化建構分析。例如蕭阿勤（1999）指出臺灣 1970 年代後兩次「重新發現」1920 及 1930 年代的臺灣文學，論證了臺灣意識來自當代本省人的族群想像；或是王甫昌（2003，頁 61）也由族群是沒有清楚團體界線的想像物之論點出發，指出臺灣到 1980 年代末期才有族群概念浮現。

這些研究成果，雖然說明 1970 及 1980 年代的臺灣重新建構了日治時代的臺灣人，但也限縮了日治時代出現臺灣意識的歷史可能性及理論可能性。³ 本文因而主張，現代建構構論的解釋射程，可以且適合前溯至臺灣意識最早可能發生的 1920 年代。

參、臺灣意識出現於日治時期的相關文獻評述

臺灣在 1920 年代是否已出現專屬臺灣的民族主義？這一小節將評述相關成果，並將討論脈絡扣連到現代建構論者（尤其是安德森）的關懷。

早在 1960 年代，美國就已有政治學者如 Maurice Meisner（1964）、Douglas Mendel（1970）提出臺灣在日治時代出現了福爾摩沙民族主義（Formosan nationalism）的論點。這個年代的相關論述，大都寓有抑強扶弱、支持民主的用意，也強調政治自覺（self-consciousness）之於民族主義的重要性。類似的論點在臺灣也於 1970 年代出現，王詩琅的《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可為代表。王詩琅（1980，頁 68）指稱日治下的臺灣反抗運動「都是由反日民族意識出發，而以排除異族的統治，恢復本來的面目，民族自主為目標」。此種抗日意識史觀將 1920 年代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都解釋為先有「不願奴化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再有留日學生、臺灣知識份子「深作民族覺醒」（王詩琅，1980，頁 63），再有《臺灣民報》傳播而予民眾所知。

然而王詩琅並未釐清「民族覺醒」是臺灣依附的中國民族，或是獨限臺灣的臺灣民族；也未辨明《臺灣民報》是傳播覺醒意識之工具、或是創造意識的來源。以原生本質論來看，血脈相連的臺灣和中國或許不須區辨，思想與媒介的關係也不須釐清；但在現代建構論的概念下，這卻是重要的理論關鍵。

作為現代論的民族主義學者，安德森關注的是，現代社會雖然造成傳統共同體崩潰，致使人們散布在廣闊的空間，卻在歷史上集結為一個

又一個實質空洞、精神厚實的民族國家。安德森將民族國家稱為「想像共同體」，意指既透過想像成為具備主權的至高性（imagined as sovereign），還透過想像成為具備有限的邊界（imagined as limited; Anderson, 1983/1991, p. 7）。因此想像不是幻想（illusion），而是力量強大的集體意識；但這個集體力量如何在散布的個體形成，安德森略帶模糊地設想「印刷資本主義」在其間扮演的無比重要性（p. 11）。

若將安德森的理論移置到臺灣的脈絡，當然就遇到適用性的問題。恰巧安德森本人也曾對日治下的臺灣案例有所解釋，並且遭到一些質問。本文將以此為引信，將安德森的理論與本文的關懷逐漸結合，透過相關文獻依序回答：（一）日治時期的臺灣是否有過民族主義式的想像共同體？（二）臺灣人言論的主要園地《臺灣民報》系統作為傳播媒介的意義為何？

本文將指出，日治中期確實出現過具有民族主義內涵的臺灣意識，進而在這個史實成立基礎上討論《臺灣民報》所代表的活字印刷「媒介環境」之形成，才使新文學作者「想像」了一種全新的讀者，並以這些不認識的讀者對象寫作出全新的臺灣認同。以下分由兩段討論進行。

一、日治時期的臺灣出現過民族主義嗎？

日本殖民時代臺灣人爭取自主的臺灣意識運動，是一種民族主義嗎？方孝謙、荊子馨等學者基本上否定這種日治臺灣出現過民族主義的看法。方孝謙（2001，頁 120-121）強調殖民體制下臺灣社會的高度異質，論斷當時「人民」論述游移不定，因此他不相信閱讀《臺灣民報》的讀者可得到清晰的民族認同信息，也不接受臺灣人在幾代之間忽然對臺灣詮釋出是「具備首尾一貫民族的意識形態力量，足以鼓舞當下的

『臺灣民族主義』」。荆子馨 (Leo T. S. Ching) 研究 1930 年代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同化與皇民化的矛盾，也指出日本想讓臺灣「成爲『日本人』」的作法雖然失敗，但臺灣內部階級混雜的「糾結對立」，其實也造成臺灣人雖然堅持臺灣意識、但卻將自主性置放於在日本帝國的架構中 (Ching, 2001 / 鄭力軒譯, 2006, 頁 125)。事實上，安德森本人也曾就臺灣的民族主義發表看法。他認爲日本殖民時期的強權，屬於民族主義四個類型中的官方民族主義、而臺灣屬於克里奧民族主義 (Creole nationalism; Anderson, 2003 / 吳叡人譯, 2004)。⁴ 因此在臺灣發展的二元式抵抗，只是類似歐裔殖民後裔脫離母國的反抗獨立，並不構成特殊的類型。

不過，政治學者吳叡人則以建構論的精神掌握了民族主義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合而爲一」，指出臺灣知識分子早在 1914 至 1915 年那個失敗的「同化會運動」中，就在政治上確立了民族自決的攻勢原則，而在文化上，則經過十餘年的守勢與摸索才確立認同的基準。吳叡人認爲，日治後期的臺灣社會，因爲日本的帝國和民族國家氣勢轉趨強硬，因而在臺灣社會強化了二元對立的「差異」架構，連帶催生了臺灣人的「認同」架構，此即福爾摩沙意識形態 (Formosa Ideology; Wu, 2003)。吳叡人認爲日本的東方殖民主義 (Oriental Nationalism) 既具有排他性格、又強將被殖民者納入國家分工系統，以此論證臺灣人先萌發反日本同化論述的「政治民族主義」，而後 1920 至 1930 年代湧現「臺灣文化民族主義」，成爲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邊緣性」 (double marginality) 結合 (pp. 151-154)。

吳叡人 (2006, 頁 132) 提出二元對立架構的歷史成因，並且精確指稱臺灣民族主義形成的建構論基礎，就在於前述 Gellner 的「政治疆界與文化疆界合而爲一」的命題。因而，吳叡人乃致力論證臺灣反殖民

菁英如何將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想像合而為一。在討論 1920 年代臺灣菁英形成文化疆界的過程時，吳叡人例舉的是 1923 年康德主義學者陳逢源在《臺灣》雜誌的〈作為人生批判原理的文化主義〉，認為陳逢源率先主張日本應尊重「臺灣獨特的文化」，即為臺灣人發展政治上的文化人格，恰呼應了同化會宣稱的「特殊參政權」代表臺灣人的政治人格。因此吳叡人（頁 149-150）推斷，Gellner 所說的政治與文化邊界重合的「民族國家」想像的端倪源生於此。

本文基本上同意吳叡人這樣的論點。前述關鍵的 1920 年代，適逢最後一次武裝抵抗（噍吧年事件）已掃平，之前黃國鎮、黃朝、羅臭頭、余清芳等草莽皇帝式臺灣意識已告終結，之後的臺灣意識則改換了完全不同的表述形式。歷經二十餘年理性科學為本的統治，日本政權已解消臺灣的地方社會基礎，建立一個以國土為單位的均質性空間統治（蘇碩斌，2010，頁 252-258）。因此民族主義出現在這個時代，有其理論上的可能性。

然而這裡可注意到，吳叡人（2006，頁 150）在援引 Gellner 的國家與文化「聯姻」（marriage）說法來論斷 1920 年代臺灣意識發生時，所用的措詞是「政治與文化邊界」重合，也就具有濃厚的安德森意味。因為就如前文所述，安德森指稱「想像的共同體」最重要意涵就在於想像為有主權、想像為有邊界。然而吳叡人這裡卻未加區分「文化疆界」與「文化想像」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也就是說，1920 年代初期由思想菁英想像出來的詞彙，如何具有邊界的意含呢？或說，臺灣思想菁英想像的「文化獨特性」，如何具有邊界的想像呢？這一點，吳叡人似就略有跳躍而未加處理。

二、現代國家型態下互不熟識的臺灣人民，如何具有同一種人的意識？

或許這裡有必要再回到安德森印刷資本主義促成民族主義的理論本身。本文試著論證，印刷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作用力。安德森雖然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印刷的溝通技術」、「人類語言多樣性的宿命」等三種力量之爆炸性互動，共同形塑了民族主義的興起（Anderson, 1991, pp. 42-43），但安德森在書中的論證則並未提及印刷生產的面向，而著重在印刷語言的面向，關於四波民族主義的形成案例，安德森在每一波都提及印刷語言的作用力。例如，在 1691 年起新西班牙（New Spain）印刷報紙革命例證的第一波克里奧民族主義（p. 61）、1820 年代芬蘭印刷文學語言例證的第二波歐洲民族主義（p. 74）、1870 年代日本發展印刷出版以教育大眾識字例證的第三波官方民族主義（p. 96）、1920 年代越南人以小學法文課本表達民族文化例證的最後一波殖民地民族主義（p. 128）。

安德森意在說明 18 世紀以來各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界定為「民族」的歷史狀況（Anderson, 1991, p. 46），亦即，歷史上出現的各種民族主義，若以新的想像共同體姿態出現，必然需要印刷語言。因此安德森以理論性的語言宣稱，發明民族主義的是印刷語言，而不是某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not *a particular language per se*），並認為印刷語言是民族認同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 p. 134）。但是，作為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的印刷語言如何在想像共同體之間作用，則是安德森未能指明之處。

想像共同體並不是憑藉傳統的面對面互動空間，也不是憑藉古老的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⁵ 而是憑藉著在廣泛地域星羅棋布的人們形成之同質而空洞的共時性（simultaneity），因此歷史上必須仰賴小說和報紙來構成彼此的想像（Anderson, 1991, p. 28）。但是安德森這個印刷資本主義概念，也經常被認為等同於傳散（diffusion），在臺灣日治文學的討論中，也有引述安德森理論以討論日治時期的文學與民族意識，並援引讀書人口、識字率、傳播效果來論證的論著，例如藤井省三和林淇瀆。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討論 1930 年代臺灣讀者市場的研究，結合安德森及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探討臺灣日治時期是否存在公共領域。他指出臺灣應該在 1930 年代後經由皇民化運動提升日語理解力，日語讀書市場成長到 320 萬人數規模，殖民地臺灣才具有規模足夠的印刷文學人口，才有可能出現以日語為根基的「讀者市場」（藤井省三，1988／張季琳譯，2004，頁 33，45-47）。藤井省三藉由實際人口規模的讀者市場作為安德森印刷資本主義的操作定義，並視為引導「公眾與公共領域」登場的機制，推論當時漢語人口並沒有成為讀者市場的條件，也將沒有形成公眾的可能。廖炳惠（P. H. Liao, 2006）也以類似的圖示在連結「印刷文化」造成「公共領域崛起」的論點，直接認為報紙、定期雜誌、書刊的大量印行，就足以形塑公眾的想像。另外，林淇瀆則以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理論強調語言是「權力的鬥爭場域」，論斷 1920 年代起的白話文運動是臺灣人搶佔位置進行鬥爭的工具。林淇瀆基於文學傳播的概念，將臺灣意識的出現解釋為：文人的意識透過報紙的推展而「起了改變民眾意識形態的作用」（林淇瀆，2001，頁 143-144）。前述的文學傳播，基本上是一種大眾傳播的模型，臺灣意識在此則被釋為傳播的「效果」，是由具有自覺意

識的發送者（sender）透過媒介工具傳散給予接收者（receiver）。

藤井省三與林淇瀆的歷史解釋，都以「作者傳遞訊息、讀者接到訊息」的效果論作為預設，或可簡要歸納為：臺灣意識形成的過程，是由民族意識作者之意圖寫作成文，並由識字讀者正確解讀。這種論點已將想像共同體的讀者「具象化」成為實際存在的識字讀者，其研究方法則是直接探討識字讀者、傳播途徑、有無效果。此雖有助釐清 1920 年代的時代背景，但宣稱的「效果論」研究依然無法確證。因為，民族主義作為社會現象，不可能以全社會 100% 的人口同意為基礎，也不須由識字讀者的百分比來保證。對於安德森所稱印刷資本主義的理論，勢必改採其他的理解方式，以在方法論上避開讀者效果的研究困難。本文期能論證，民族主義的想像是由作者發動，但卻是作者以他所要訴求的讀者作為邊界而具體化。

安德森並未能釐清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也未解釋印刷資本主義造就民族主義的「社會機制」。我們必須注意，現有資料不可能直接「研究讀者」如何想像這個共同體，反過來說，民族主義歷史研究經常使用的文學、小說、報紙材料，也大都須透過「研究作者」才能證成。在下一個小節，將回歸媒介理論以掌握印刷資本主義的意義，同時也為「透過作者而得到讀者意識」的研究方法，賦予方法論上的妥當性。

肆、作者與讀者的媒介：民族主義建構的方法論基礎

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實際傳散效果、也不在於市場規模大小，這一點安德森曾在《想像共同體》書中註釋引用麥克魯漢的概念來旁證。可惜的是，安德森（Anderson, 1991, p. 34）想要表達的「即使書籍市場遠遜於其他商品市場，但是其散布概念的戰略角

色，則在現代歐洲發展佔有核心的重要性」，在論著中並未清楚的說明。

散布概念的戰略角色，並不等於散布概念的具體效果。Gopal Balakrishnan (1995) 曾特別指明安德森這個方法論問題：他認為安德森承襲韋伯 (Max Weber) 企圖掌握舊的神聖共同體崩解後的集體再魅 (collective re-enchantment)，只不過以民族國家代替理性 (rationality) 來論證。因此 Balakrishnan 認為安德森的創舉是將民族主義的文化起源推至十五世紀現代早期 (early modern) 的方言文學 (後來的國語文學)，強調基督新教使用方言印刷流通的小冊子去反對教會拉丁文貴族 (p. 62)；是以 Balakrishnan 認為，即使路德和喀爾文的反教廷傳單很少提到民族國家，亦無妨安德森的推論，因為安德森方法論基礎其實是「媒介即訊息」的概念。⁶ 印刷資本主義作為媒介的力量，重點在於造成一種「使人想像神聖的特殊文化」，而不是工廠的生產形式。

循此，本文認為欲理解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概念，必須回到提出「媒介即訊息」的媒介學者麥克魯漢之理論脈絡；亦即，將印刷資本主義視為印刷造成的媒介文化環境，以補足安德森略而未談的方法論基礎。這一節將有二個論述步驟：一是修正文學傳播史研究的「作者中心論」方法，二是釐清作者與讀者的中介關係。

關於前述第一點，其實所有利用歷史材料的研究，都面臨讀者研究的困難——因為當代研究者幾乎都不可能取得讀者論述的直接文獻。以文字型態留存的報刊評述、文學創作，因為取得相對容易，向來是學者的重要素材，甚至被當作論證當時社會現象的直接史料 (primary sources)。但是文學報刊材料只能及於作者 (writer) 及作品 (work) 而不能及於讀者 (reader)，因此以作者的政治意識自覺為因、寫作傳

散予大眾知悉爲果的設想，也都只是藉由「作者意識」證成「讀者意識」的方式，而非直接的讀者意識研究，也無法克服前述的方法論困境。

本文對日治時期活字印刷與作者、讀者的解釋，當然也不可能進行「直接的讀者研究」，而只是試圖在方法論補充「作者意識」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論證廣大「讀者意識」的正當性。在此可由沙特（Jean-Paul Sartre）在《文學是什麼》（*What is Literature*）提出的根本論點開始：文學創作並不由作者獨自完成。

沙特指出「創作只有在閱讀之中才能完成」，意指文學作者只有通過讀者的意識，才能將自己視爲作品的本質；因此他也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所有文學作品，都是對讀者的訴求（appeal）」（Sartre, 1998, p. 32）。文學作品雖然由作者書寫，但作者是先經過訴求讀者再返回自身而書寫，因此作品本身必定填充了讀者在內。沙特清楚區分了前現代作者訴求的讀者是贊助寫作的貴族、現代初期作者訴求的讀者是新興的布爾喬亞，但現代作者則必定「訴求」不特定的閱讀人口。如果過去手抄本時代的作者與讀者同是熟識的文人圈，那麼活字印刷時代的作者，必然不再熟識，甚至無法指認他的讀者。

以下進入第二點的討論：作者與讀者是什麼關係？本文認爲「現代作者與現代讀者」之間、或說「現代書寫與現代閱讀」之間的關係，是活字印刷造成的媒介現象。媒介，借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考察，在當代至少擠壓三重歷史意涵：其一是中間物意涵，指初民社會開始就在人神之間傳遞訊息者（如祭司、靈媒），其二是技術物意涵，指 19 世紀運輸及通信工業的文明（如電報、無線電）；其三是資本主義組織意涵，指 20 世紀獨佔性的鉅型大眾傳播機構（如報社、電視臺）（Williams, 1976／劉建基譯，2003，頁 240-241）。威廉斯認爲當

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使得媒介被視為鉅型傳播組織的同義詞，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因而也被化約為單向的傳播關係，反而忽略了媒介最古老的根本意涵——作為人類感官體驗世界所必需的「中間物」。

麥克魯漢理論就在強調媒介的中間物意涵。他解釋媒介是「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 of man），而不是客觀傳達人類訊息的工具，因此某種媒介被社會發明並使用，必定改變人類的感官及知覺平衡，從而改變人與人的互動形式（McLuhan, 1995／汪益譯，1999，頁 31-35）。麥克魯漢認為 15 世紀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術造成「大量而快速製版」的機械複製革命，累積普遍化且可保存的文字資訊，使得人類擺脫了依賴與他人共同在場以取得訊息的聽覺時代，來到眼睛成為主要知覺形式的視覺時代（McLuhan, 1964, 1967）。

在此理論指引下，印刷媒介並不是傳散工具，而是人們置身的生態環境，⁷ 足以形塑了當世人的時間觀念與空間型態。日本社會學者佐藤健二（1987）接續麥克魯漢理論，以「讀書的空間」來形容這種媒介影響的作者與讀者關係。他認為，活字印刷造成書寫文化普及，也促使大量人民成為被鎖進膠囊一般的「獨學者」，世界也因此成為書寫者與獨學者構成的「讀書的空間」。意思是說，作為獨學者的讀者，是將作者書寫的文字閉鎖在自己的世界中獨自閱讀，並「想像他的同胞們」而構成新空間。他的同胞們，當然不會漫無邊界，而只限定在閱讀同一種印刷文字的人群，因此也呼應麥克魯漢說的「人們依照各國方言而在政治上統一，若非因為印刷術將方言轉化為大眾媒介，將是無法想像的」（McLuhan, 1964, p. 161）。

前述媒介理論的分析，指明了作為「媒介」的活字印刷構成作者與讀者的同胞想像，而不是作為「內容」的文學意識傳遞到無知者腦中而感化他們。這也可為《臺灣民報》與臺灣意識之關係賦予新的理論意

義。

臺灣意識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已因雙重的二元對立架構而出現，但機制是什麼？本文不同意文學傳播論主張的「文人先有政治自覺、再藉報紙傳散眾人所知」的理論模型。因此，本節將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影響民族主義形成」的理論漏洞，以媒介理論加以補充，期能為臺灣意識與大眾報刊的關係，提出更適當的新解釋途徑。亦即，在本文的媒介理論架構下，向來被認為是傳散臺灣意識的《臺灣民報》，並不是被動的傳播工具，二者反而可能是逆轉的關係：以活字印刷形式印行的《臺灣民報》，讓作者認知了不特定、不認識的全新讀者，並以這種新讀者為訴求對象，因而「文學作者的書寫文字」乃形構一個讀書的空間。藉由以上的理論，本文也才主張「以作者的意識（《臺灣民報》的書寫文字）解釋讀者的意識（臺灣人的意識）」具有方法論上的妥適性。

前引吳叡人論證臺灣意識出現的 1920 年代，正是若林正文（1987）指稱日治臺灣反抗殖民運動由武力的傳統民族運動轉為非武力的近代民族運動，《臺灣青年》創刊到《臺灣新民報》的發行，也一直被認為是關鍵角色（楊翠，1993，頁 81-82）。這個統稱「臺灣民報系統」的印刷媒介，由 1920 年 7 月的月刊《臺灣青年》開始，歷經月刊《臺灣》、半月刊《民報》、週刊《民報》、週刊《臺灣新民報》，再於 1932 年 4 月發展為日刊《臺灣新民報》（李承機，2004，頁 18）。《臺灣民報》系統刊載的文學作品與評論，也就是所謂的「新文學運動」或「新文化運動」之成果，一直被認為具有自我書寫的「主體性」意義及抵抗殖民的「民族性」意義。

在 1937 年被迫廢除漢文欄以前，《臺灣民報》系統一直以漢文或臺灣式「白話文」為主體發刊。尤其是在 1920 年代初期，臺灣本地人

進入公學校習得日本語者僅佔同齡人口的 10%（上沼八郎，1975，頁 315-316），這個日本語人口不足的狀況，也使得漢文新聞被視為臺灣意識傳播的重要工具。但隨之而來的更大問題是，漢文新聞既然僅有極少臺灣人知識份子在書寫，也僅有數量不多的識字讀者在閱讀，如何能形塑民族主義？文學傳播論似乎無法處理這個問題。本文以前述媒介理論為解釋架構，在以下第伍節將先論證臺灣意識出現的時代已是活字印刷媒介普及的時代，再於第陸、柒節繼續論證新文學作者們在《臺灣民報》的文字中訴求的不特定讀者，即使在實質（地理）意義上是空洞的，但卻在精神意義上愈加具體，也就是邊界清晰的「想像共同體」。

伍、日治時期臺灣的活字印刷媒介與文學環境

日治時期的活字印刷，提供了速度化、標準化的社會場景，也造就了近代文學產生的社會環境。臺灣（新舊）文學論戰頻生、臺灣意識冒頭而出的年代，也是臺灣文學作家對印刷技術認知發生轉變的年代。這個年代約在 1915 至 1930 年間，原本仰賴雕版（木刻）印刷轉型成為仰賴活版印刷。

儒學士紳自乾隆、嘉慶年間在臺灣出現，並至咸豐、同治年間普及全臺（蔡淵黎，1980，頁 139），但文人用書則都仰賴中國進口，如清末臺南米街進士施瓊芳（1992，頁 7）記述「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即使有少數本地印刷業（如臺南松雲軒），也都是採用雕版技術印製善書、詩集及兒童教本等（辛廣偉，2000，頁 2-3）。連雅堂在 1906 年至 1915 年間採編的《臺灣詩乘》曾經記載「蓋以臺灣剗刷尚少，印書頗難」（連橫，1960，頁 142），意指甚至連雕版工匠都很少。然而連雅堂在 1932 年為《三六九小報》撰寫〈雅言〉

專欄的一篇「印版考」中，則已提及「臺南之松雲軒亦能雕鐫；余有『海東校士錄』、『澄懷園唱和集』二書，則松雲軒之刻本也」（連橫，1963，頁 56）。連雅堂說的《澄懷園唱和集》著於 1915 年前後，當時選擇臺南松雲軒以雕版印書，但在他 1932 年另一篇〈印版考〉則另記載「海通以來，歐洲輸入印書機器，用鉛製字，則今之活版也」（連橫，1964，頁 24）。根據連雅堂的上述生平記事，可證臺灣文人具體感受印刷環境的變化，大抵就在 1915 年至 1930 年之間；由此也可論證稍後討論 1920 年代《臺灣民報》等刊物的作者活躍時期，臺灣書刊已由雕版印刷轉為活字印刷時代。

若再以臺灣當時報紙的印刷與流通情形來看，也可證實印刷技術在 1915 至 1930 年代成形的趨勢。臺灣可考的活字印刷機設備，最早在清末（1885 年）即由英籍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受贈英國長老教會帶到臺灣，用以印刷出版《臺灣府城教會報》（張妙娟，2005；Band, 1972）。這份報紙雖跨越百餘年、出版二千餘期，但是發行對象限於教會內部，因而在臺灣印刷史也就獨自發展，本文因此略去不談，逕以日治時期半官方的《臺灣日日新報》之設備來旁證當時印刷的社會狀況。

《臺灣日日新報》雖主要以日文刊印，但 1905 年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分離出漢文欄，這個通稱的《漢文臺日》每日發行量逾 4,000 份，1910 年每日發行量逾 6,000 份（李承機，2006，頁 25）。臺灣日日新報社當時已有的印刷設備，據考察至少為高速輪轉機一臺、輪轉機三臺、平盤 12 臺、維多利亞式印刷機一臺、石印機二臺、石版手搖機八臺、自動活字鑄造機三臺、製本用機械二十餘臺（黃純青、林熊祥主修，1983，頁 369）。這些機器除了供應日日新報發刊，也兼營民間印刷。1912 年甫成立的中華民國官員施景琛，在他來臺見聞錄〈鯤瀛日

記〉曾記載「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社中機器數十部，兼營印刷業」（施景琛，1960，頁 46）。文中「日出三萬餘紙」或許誇大，但大抵可知當時臺灣社會已廣泛使用活字輪轉印刷機。

1926 年總督府新聞檢閱官員鈴木清一郎（1937，頁 15）對當時「印刷物」的法令釋義，也證實社會普遍認為報紙的定義是「在一大頁用紙上以活字印刷而附有一定題號之定期繼續發行」。雖然鈴木清一郎澄清法律認定的報紙定義是具有題號、期限、著作物，不限印刷用紙及方式，但由此可見 1926 年間報紙已普遍使用活字印刷，且為臺灣社會的普遍認知。同時期工藤折平（1933，頁 1）《臺灣出版警察の研究》一書開頭描述「近時因印刷機械之進步，技術之提升，在短時間內得以多量印刷，及至產生一日發行百萬部的新聞紙……膨大的印刷物在短時間內輸送頒布，展現出通信的速度時代」，說的也正是「活字印刷」的標準化、大量化威力。以上概可推斷臺灣在 1910 年以前就有活字印刷設備，至 1930 年代已足以展現印刷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遷。

臺灣本島人在 1910 年代的讀報人口，粗估只有「諸區長、保正、紳商、官吏」約八千人而已，1920 年代才是臺灣人報紙購讀層大幅增加的開端（李承機，2004，頁 257-258）。《臺灣日日新報》（尤其是漢文欄出現後）得以長期經營，除因具有「御用性格」之外，也是因為長期獲利的「資本主義性格」。支持其獲利的，應就是接受臺灣傳統漢學教育系統的漢文讀者。《臺灣民報》初發行時，粗估這些報紙購讀人口約為總人口的 5%（18 萬人）（李承機，2003），數量雖不多，但已是雕版印刷的印量無法滿足的族群；反過來說，《臺灣民報》出現之時，臺灣本地已培養出必須使用活字印刷的讀者條件。

《臺灣民報》系統最初是 1920 年創立的《臺灣青年》月刊，使用日文及漢文寫作，在東京印刷，發行範圍除了臺灣，也在日本本島及中國沿海流通。而當時臺灣審閱制度嚴格，所以屢因文字不符當局規定而遭禁刊。這份雜誌在 1922 年更名為《臺灣》，1923 年 4 月再創刊《臺灣民報》半月刊，逐步採用易懂可讀的口白文字，並淡化理論取向、適合民眾閱讀，再依次改為旬刊、周刊的方式，因此進到臺灣二年多之後的 1925 年 8 月，估計發行量已經「成長到和臺灣四日刊報紙並駕齊驅」（河原功，1998／莫素微譯，2004，頁 129）。根據《臺灣總督府統計書》既有的統計資料，1920 年代末及 1930 年代初《臺灣民報》每刊的平均發行量分別是 1927 年的 18,528 份、1929 年的 6,958 份、1931 年的 6,905 份、1933 年的 26,634 份，長期均值至少超過一萬份（李承機，2004，頁 349）。

另外，林淇瀟（2001，頁 109-111）根據《臺灣民報》系統的八次改版的資本結構變化，指出《臺灣民報》不獨是知識分子的言論場所，也能符合資本主義的獲利法則。林淇瀟指出民報系統的資本額成倍數成長，由最早《臺灣青年》月刊接受蔡惠如捐獻 1,500 日圓，到《臺灣》月刊資本額 25,000 日圓的公司組織，再至《臺灣新民報》發刊日報改組增資為 300,000 日圓的「臺灣新民報社株式會社」，已無疑具備近代化報業的資本經營模式。

這些研究成果雖指出報業經營的近代化，但實際的讀者群或印行量，又如何確證臺灣三百六十萬人的意識？旬刊報紙一萬份的發行量雖足以獲利，只是臺灣士紳個人投資的利益計算，用以論證印刷資本主義出現在臺灣，似不盡符合脈絡。因此，本文認為應循前節所述，對印刷資本主義賦予媒介理論意涵，亦即，只要活字印刷出版的情境發生，作者對讀者群的想像就會改變，不論實際讀者市場有沒有擴張。在 1920

年代的臺灣，文學作者書寫時「對讀者的訴求」，已由原先傳統的文人雅士及親朋好友，轉變為大量、不特定、可能閱讀書報的同胞讀者。

陸、與舊文學決裂的新文學之共時性臺灣人想像

新文學是留日學生為主發起的白話文創作文學運動，他們反抗的舊文學，則是傳統接受漢學的詩社文學。那麼臺灣活字印刷革命如何引起「新舊文學論戰」？藉由前田愛（1973/2001，頁 166-210）的「朗讀—默讀」之對比概念或可說明。傳統文人以集體大聲唱和的「朗讀」作為讀書經驗，現代社會則因活字印刷普及和閱讀人口擴張，改以個別獨自感受的「默讀」作為讀書經驗。就如麥克魯漢所說，「手抄書稿和古老的印刷物之閱讀，都必須大聲朗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詩，朗讀之外還要配上音韻吟唱」（McLuhan, 1964, p. 147）。依此理論也就能解釋，臺灣新舊文學論戰的兩造，是以個別讀書為形式、以抽象同胞為內容的新文學，挑戰以熟識友人在場共同吟詩為形式、以古老歷史傳承為內容的舊文學。

日治臺灣的傳統文人仍然保存了漢學的基礎，寫漢字、作漢詩是典型。日治初期約 1898 年起，臺灣舊文人紛紛成立詩社，例如臺中櫟社、臺南南社等（王文顏，1979）。詩社聚會都是實體在場的集會吟唱，限時即興作詩、擇優設獎的「擊鉢聯吟」更是盛行一時。舊文學以舊詩表達詠史、詠物、詠景，是一種傳統時間觀；吟唱時必須眾人共同在場（co-presence），是一種傳統空間觀。以此概念來看 1924 年至 1925 年新文學提倡者密集在《臺灣民報》的連串批判文章，就是在切斷舊文學的接續古人的時間觀與共同在場的空間觀，並營造全新的時間觀與空間觀。

張梗 1924 年在《臺灣民報》以〈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系列攻擊舊文學：「臺灣那裡有小說之可言。不過是那些中國流來的施公案彭公案罷了」（臺灣民報，1924.9.11: 15）。這篇連載七期的長文嚴厲指責舊詩文只顧研究古來王公卿相：「我們不得不生出一種疑問『爲什麼古來偏做這些與民眾日常生活無關痛癢的小說呢？』」

一郎（張我軍）的〈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也批判舊文學連結舊中國，痛砑「臺灣的一班文士都戀著壟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臺灣民報，1924.11.21: 6）。張我軍的批判持續強烈，1924 年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以更嚴厲的語句批判詩社一群自稱詩翁、詩伯者：「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作詩韻和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臺灣民報，1924.4.21: 10）。

他不僅指責舊詩文只在技巧上要弄，在 1925 年〈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一文更說：「詩，和其他一切文學作品的好壞，不是在字句聲調之間，乃是在有沒有徹底的人生觀和真摯的感情」。由此概念，張我軍斥責的臺灣舊詩，主要就是斥責擊鉢聯吟形式的活動。他指稱「他們爲什麼要開擊鉢吟會呢？總括說一句：也有想得賞品的，也有想顯其技巧的，也有想學做詩（技巧的詩）的，也有想結識勢力量家的」（臺灣民報，1925.1.11: 7）。

對照張我軍在 1925 年《臺灣民報》〈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檣中的破舊殿堂〉中引述陳獨秀「三大主義」，亦即「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臺灣民報，1925.1.1: 7），新文學宣稱的參照對象無疑是「國民、寫實、社會」的此地共時性，而拒斥舊文學「貴族、古典、山林」的異地貫時

性。

張我軍的宣稱堪稱臺灣文學的「時空感」轉變關鍵，使臺灣社會的「讀書的空間」與歷史古典斷絕，而與同時代人聯結。懶雲（賴和）在 1926 年一篇〈讀臺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沒有張我軍的激動主張，更持平地說出以「民眾」為判準的觀察心得。他說：

舊文學的工具 本來不十分完備 且其對像在士的階級——所謂讀書人——不屑與民眾——文盲——發生關係……新文學的工具雖尚未完備 比較多些一點 且以民眾為對像（臺灣民報，1926.1.24: 11）。

懶雲的對比式區分，確證新文學作家「訴求」的讀者並不是熟悉的雅士或識字的書友，而是包括那些不太可能閱讀的「文盲」在內的潛在讀者。由此看來，新文學拒斥了舊文學在現場吟詩的「身體上共同在場」的文學空間，相對的，營造了不共同在場、不特定讀者的文學空間；新文學也拒斥了舊文學與古人唱和的線性時間（歷時性），相對的，形塑了與不特定的民眾分享日常生活的共同時間（共時性）。這也印證朗讀到默讀的變化。默讀的社會習性，意味獨自閱讀的讀者們必須仰賴想像的共時性來維繫同胞的一體感。

新文學起自 1922 年甘文芳的〈日用文改革論〉，在 1924 及 1925 年爆發與舊文學的論戰，至 1925 年張我軍出版《中國國語文法》一書後稍歇，這一段時間也被稱為「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引進」的新文學運動第一期。這時期的新文學以中國的五四運動模式確立發展的理論基礎，尤其是以「言文一致」的平民性格，作為打破「言文分離」的貴族性格的工具，但這同時埋下了一個矛盾性：言文一致的平民性格的「平民」，究竟有沒有邊界？可以延伸中國？或是只限定臺灣？

《臺灣青年》在 1922 年時刪去「青年」二字，留下《臺灣》作為

刊物的新名稱。更名前的《臺灣青年》三卷一期卷頭詞曾述及更名理由：「應時勢之推移與我島文化之要求，沒有幼、少、青、壯、老之差別」（楊肇嘉，1968，頁 410-411）。亦即，《臺灣青年》的作者們雖然並不知道讀者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讀者是一群不特定人。但這裡要強調的是，不特定人並不是無邊界的漫漫人群，而是有邊界的「沒有幼少青壯老之分」的臺灣所有人，是否真能識字、是否真能讀書，都不是想像訴求的關鍵。因此，楊肇嘉（頁 422）乃稱「『臺灣民報』在其先期『臺灣青年』、『臺灣』的時代，乃不過是一群知識青年的思想表達的機關而已，還沒有普遍報導的機能」。

其實 1920 年代初期《民報》創刊以前，主張「抗日」的留日臺灣菁英，就開始出現「臺灣」的全稱。1923 年《臺灣民報》創刊之前數月，《臺灣》雜誌連續刊出廣告稱：「一個大大的臺灣，有三百六十萬同胞，實在沒有一個代表我們的言論機關。使世間的人，幾乎不知天下有個臺灣。你道可愧不可愧？……所以自四月十五日起，既經有發行一種半月刊，名叫『臺灣民報』」（黃秀政，1987，頁 30）。《臺灣民報》這個創刊詞也宣稱：

請問同胞諸君，現在我們臺灣人甘自認做劣敗者麼？願受人淘汰麼？……唉！最親愛的三百六十萬父老兄姊！我們處在今日的臺灣社會，欲望平等，要求生存，實在非趕緊創設民眾的言論機關，以助社會教育，並喚醒民心不可了（臺灣民報，1923.4.15: 1）。

「三百六十萬父老兄姊」，當然不是實際讀者的數字、也不是識字讀者的數字，而是「訴求」讀者的數字。就如前文所述，三百六十萬人是一種「宣稱」，不是「傳播的結果」，這個宣稱在傳播發生、在喚醒民心之前就已存在。由此呼應前述的理論，印刷資本主義對於想像共同體的作用，是作為抽象的媒介環境，而不是作為具體的傳播工具。

新文學運動之初的邊界並不清楚，至少不時會指涉到中國大陸。最早投入新文學運動的黃呈聰、張我軍等人筆下，都曾主張向中國借用「普遍的文」，例如黃呈聰在《臺灣》雜誌撰文主張臺灣使用中國文字：「不但我們的範圍擴大到中國的地方，就是有心到中國不論做什麼事也是很方便」（臺灣，1923.1.1: 21）。黃呈聰倡議白話文所設想的，其實是為臺灣人打開更廣闊的心靈，「我們雖然是生在一個小小的臺灣孤島，總是我們也是宇宙間人類的一部分，既然是人類總要合世界人類的生活」（臺灣，1923.1.1: 22）。他認為：「我們的文化是要受東洋和世界全體的支配〔，〕我們應該和世界的人做共同的生活，才能叫做世界的臺灣」（臺灣，1923.1.1: 24）。在這樣的脈絡下，黃呈聰思考的臺灣是文明現代的臺灣，而未必是附屬於何國、或是否需要與中國切割的臺灣：

中國就是我們的祖國，我們未歸日本以前是構成中國的一部分，和中國的交通很密接，不論中國有發生什麼事情很容易傳到臺灣，若就文化而論，中國是母我們是子，母子生活的關係情濃不待我多說（臺灣，1923.1.1: 17）。

這個時期的文化民族血緣，是起因反抗日本而存在，張我軍「臺灣文學乃中國文學支流」的論調，也都默認背後需要「一個大勢力來保存我們的文字」之類的依附中國想法（臺灣民報，1925.1.1: 7）。顯然在這個臺灣作為具體名詞初現的 1920 年代，知識份子筆下的臺灣仍是中華母國文明的子嗣、三百六十萬人仍是祖先骨肉的同族。臺灣意識，至此雖已明確抗日，但仍沒有作為臺灣的獨特邊界，仍處在含混的醞釀狀態，而印刷媒介的力量持續在作者與讀者之間衝撞，也漸將發展出排除其他認同（中國認同）之意義。

柒、邊界逐漸清晰的三百六十萬臺灣人的臺灣

黃呈聰發表臺灣言論的 1920 年代初期，臺灣同胞想像邊界仍然模糊，至少與中國未能區辨。某些論者曾讚頌黃呈聰等抗日份子藉迎合主義討好日人，但動機如何，事實上並不那麼重要（游勝冠，2009，頁 26-27），因為再來的發展已超越個別作者動機的作用力。臺灣意識在新文學作者的後續論戰中，逐漸與中國區分開來，成為不再依附中國的「三百六十萬臺灣人」的想像，才取得清晰的邊界，也才成為不折不扣的臺灣民族主義。

首先要注意的，是「排他性」的臺灣之出現。在 1920 年代中期之後。一個臺灣人群全體的意識，將由模糊醞釀轉為具體成形。1925 年 8 月《臺灣民報》發行量超過一萬份而出版的〈臺灣雜誌社五週年及民報發刊萬部紀念號〉專刊的兩篇文章，可為本文所稱臺灣意識想像的時代變遷做一註解。第一篇是署名「沁園」者於當期發表一段感言，遙想印刷媒介尚未沒有出現的時代，「家庭內父母兄弟，與鄰舍父老親友，各謀生活，閉戶而居，已有老子所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之慨，渾渾噩噩，不識不知，安知世有官民，又安知臺灣島外有五大洲耶？」（臺灣民報，1925.8.26: 5）而在同一期「萬部紀念號」專刊中的〈本報的自祝並對一萬讀者的祝辭〉，則寫出另一幅全新景象，形容原本老死不相往來者，並沒有因此碰面互動，但同樣的一批臺灣住民，卻已浮現共同屬於臺灣的意識：

『臺灣民報是咱大家公共的』這句話現在全島各處都可以聽到了。……讀者諸君，我們沒有民報時，豈不是找不到交換智識的地方和發表意見的機會嗎？今日居然也可以『登高而呼，四山皆應』

了（臺灣民報，1925.8.26: 3）。

「登高而呼，四山皆應」，當然不是全島各處真的聽到。雖然是作者自身片面設想的讀者，但卻是指引他寫作的對象——不特定的所有臺灣人。也就是說，《臺灣民報》這篇社論，已框構出報紙的流通、智識的交換範圍就是「全島」各處。原本在 1922 至 1924 年黃呈聰和張我軍時代，還不太清楚、會延伸至中國的模糊邊界，此時已經較為清楚地限縮。根據若林正丈的說法，由於 1927 年臺灣政治運動發生左右分裂，加上國共合作崩壞，原受中國文學影響的《臺灣青年》也開始出現「臺灣／中國」的分離思考模式（若林正丈，1987，頁 11）。

《臺灣民報》的書寫，也呼應這個氛圍，漸漸清楚感受到訴求的邊界。原本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重疊的民族思想，在 1927 年前後逐漸分離開來，更鮮明的臺灣意識浮現在文藝的討論之間。1927 年 2 月 6 日《臺灣民報》中一篇蔡孝乾的〈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二）〉明確宣稱了「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七月『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見著『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才發見了『臺灣人的臺灣』，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臺灣民報，1927.2.6: 10）。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句源出明治大學教授泉哲 1920 年為《臺灣青年》創刊賀文〈臺灣島民に告ぐ〉之時，原是呼籲島民應覺察「臺灣不是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臺灣青年，1920.7.16: 7），猶只是拒絕被壓迫者的民主呼籲。同年底蔡培火為《臺灣青年》撰寫〈我島與我等〉一文修改為「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並不否認臺灣尚處在「臣隸」狀態，「我等臺

灣人之臺灣」在此是一種解決壓迫的平權呼籲（臺灣青年，1920.12.15:40）。但在 1927 年蔡孝乾的重新詮釋，已經是打破各種隸屬（或從屬）性格的特定人群。1927 年 7 月《臺灣民報》獲准於臺灣印刷，成爲名副其實的臺灣報紙。臺灣是臺灣的臺灣，更明顯成爲藉由印刷而凝集起來的集合名詞。1927 年在臺灣印刷的第一期（167 號）中，署名「陳玉」的讀者投書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呈現這種集合名詞的內涵：

臺灣人一般雖不能自由言論，民報可以做三百餘萬人口舌的代表，成做一個大口舌，來說些大言論，這不是臺灣言論界的大福音到來了嗎（臺灣民報，1927.8.1:7）？

《臺灣民報》是臺灣邊界內居民的口舌代表，也不及於邊界外、也不仰賴邊界外。原本還會延伸至中國的模糊邊界已不再模糊，中國開始被臺灣的印刷文學切割開來，1928 年 2 月 12 日《臺灣民報》一篇〈新舊勢力的過渡時代〉，已出現這樣一段切割的字句：

臺灣人在滿清治下，受過「抽筋」、「去勢」的大手術，把自然賦與的「獨立自主」的大精神沒却，換來的一付「唯命是聽」的奴隸性（臺灣民報，1928.2.12:2）。

斥罵滿清的暴虐，臺灣人的奴性之同時，目的無非是彰顯獨立自主。自主論述，正是 1920 年代末期的臺灣知識界的論述特色。1920 年代前期認爲與中國聯絡以作爲抗日槓桿的想法，已因中國民族運動停頓而備受懷疑，借助「祖國」也越漸不可能，也就造就「臺灣」論述單獨顯露出來（葉榮鐘，1987，頁 49）。文學菁英的表現，雖不至於（如臺灣共產黨）否定與祖國的所有關係，但也明顯是要解除臺灣人枷鎖的論點，展現了文學本土論的精神（游勝冠，2009，頁 35）。老死不相往來的三百六十萬人們，藉由臺灣民報「共時性」地經驗爲同一性的臺

灣民眾，就是臺灣意識的發現過程。一樣都稱呼臺灣人、一樣都稱呼我們，但是其內涵已有所歧異，由與他人兼容（inclusivity）轉變為與他人排斥（exclusivity），也就是民族邊界漸趨明確了。

在這種時代變遷之下，原被批判為舊文學、不問社會生計的傳統詩社，在 1920 年代末期以後，也逐漸以活字印刷的報刊作為發表機制，呼籲維護島內漢文、改造臺灣社會等議題（黃美娥，2004，頁 146-157）。在 1920 年代被詬病為舊文學家的連雅堂、鄭坤五、黃純青等人，也在 1930 年代擺脫貴族階級色彩，而參與推動臺灣鄉土文學（黃美娥，2004，頁 133）。以連雅堂為例，他在 1932 年起為《三六九小報》撰寫的〈雅言〉專欄中，屢次提到「余，臺灣人也」，而且將臺灣的命運看成是文學家的責任，而說出：「臺灣民族之衰落雖至如此，而前途一線之光明，尚有望於今日文學家之指導也」（連橫，1963，頁 84）。

原本只清楚呈現在新文學的「啓蒙」姿態、以及「臺灣」想像，也在舊文學的身上浮顯出來了。到了 1930 年代，以全體臺灣人的名稱出現的文學論述，不論這個名稱是鄉土、民眾、超階級、大眾、通俗，都不斷形塑一個「有邊界」的想像族群。

周定山原刊於 1932 年 4 月《南音》的一篇文章，以嚴厲措詞反抗了臺灣靠攏中國的想法，他說：「像『向來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奴隸根性的徒抱殘闕，恐怕才是永不超生呵！這種依賴民族劣心理，不是：『已經不顧大眾而走入反動的路上』去跑〔跪〕磕他人嗎？」（周定山，1996，頁 138）黃石輝在 1930 年 8 月《伍人報》上刊登〈怎樣不提倡臺灣文學〉，更是這個由新文學運動延伸而來的「想像邊界」第一階段之總結。清代詠嘆山水的文學從未出現的臺灣及臺灣邊界，已然在這篇報紙文章中呈現：

你是臺灣人，你頭戴臺灣天，腳踏臺灣地，眼睛所看見的是臺灣的狀況，耳孔聽見的是臺灣的消息，時間所經歷的是臺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是臺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伍人報》，1930.8.16-9.1）。

一個明顯邊界的臺灣人，確確實實被黃石輝視為理所當然地浮現在臺灣的三百餘萬人之間。接續黃石輝論點，較具代表性的是 1931 年郭秋生在《臺灣新聞》為文「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而後引起賴明弘、廖毓文、林克夫、朱點人「中國白話文派」反擊的連串論戰，開啓臺灣文學另一場新論戰，也就是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或「臺灣話文論爭」。臺灣的文學界陸續出現了各種如何表達臺灣文學的主張，包括以臺灣語創作的聲音，以及反對的聲音，而在 1933 年至 1934 年則又出現貂山子（何春喜）等人主張的「標音符號派」，以及涉及階級立場的無產階級派和超階級派等等（林淇瀟，2004；陳淑容，2000）。

不論立場為何，不論是臺灣話文派的黃石輝（1930）所說的「你是臺灣人，……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或是第三階級派的葉榮鐘（1932）所說的「臺灣人做為階級的分子之前應先具有一種做臺灣人的特性」，又或是中國白話文派的賴明弘（1934）所說的「我們臺灣人既是選用漢字，我們祇有繼承前人的努力，無條件接受中國白話文以為我們臺灣新文學建設的表現工具」，報紙上爭戰的各方，都已使用全稱式的「臺灣」或「臺灣人」作為論戰的前提。這種以臺灣為前提的意識狀態，就是賡續 1920 年代「第一次形成邊界」的想像族群的「再一次界定邊界」。1930 年代號稱臺灣意識成熟的時代，並不是識字率、白話文、新或舊文學的問題而已。意識成熟的原因，來自於作者「想像的及潛在的」讀者已然成形。

捌、結語

「印刷資本主義對想像共同體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安德森這個著名卻含糊的命題，是社會理論的洞見，卻也是實證檢證的難題。以此研究臺灣的民族主義，是否必須討論印刷革命、印刷商業等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面？渥根（Peter Wogan）就指出，安德森提起「印刷資本主義」之名，卻沒有清楚界定，確使不少人誤以為他在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Wogan, 2001）。但是若由媒介理論的角度來看，討論印刷資本主義，未必要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社會為前提；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重點是指出以活字印刷模塑的作者與讀者之社會關係。

本文藉由將日治臺灣文學的發展以媒介理論重新解讀，在理論上，指出了文學作者經由「訴求」讀者而共構了一個「空間」的集體想像；在歷史上，論證了日治中期發展成形的活字印刷文學如何促成新讀者的誕生（非文人貴族的一般讀者）。文學寫作的作者，不僅意識到這些未曾謀面的、個別閱讀的讀者之存在，也轉換了所要訴求的讀者，改以想像的、潛在的讀者來反思他的書寫，開啓文學書寫的質變，更形成一個「共同的想像空間」。這個空間正是以「整體臺灣」為單位的類國族意識。

在這個活字印刷的媒合之下，全新的「想像的臺灣空間」於是在 1920 年代初期醞釀出可能性的條件。自 1920 年代中期開始十年間的日治臺灣，不論是舊文學、新文學、臺灣語文派、中國語文派、第三階級派，都在活字印刷的技術基礎之上，經驗了表達形式和表達對象的革命。透過文學論戰的資料論證，1915 至 1930 年間臺灣的印刷技術轉型為活版印刷，不僅促成臺灣文學論戰頻生，促成臺灣意識浮現，也促成

一個臺灣版的想像共同體。

在理論和歷史之間穿梭，除了理解歷史因果已不可能以實證方式印證，也是希望社會理論能提供歷史材料某種視野。在知識與資料解放時代的學者，勢必需要更多的理論觀點來穿透史料的迷霧。當然，包曼（Zygmunt Bauman）也提醒知識份子，在這個年代已經沒有立法者，所有人都是詮釋者（Bauman, 1987）；這樣想來，既沒有人有最終的知識決定權，那麼諸多歷史研究之目的，無非只是在尋找更恰當的詮釋。

臺灣意識形成、新舊文學論戰、活字印刷技術，在臺灣發展於幾乎相同的年代，並不是歷史的偶然。以媒介環境理論結合民族主義建構論，就是企圖指出活字印刷技術的媒介變革，改變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並形成了全新的社會架構。在臺灣的案例上，本文也已論證印刷術為新文學作者帶來新的訴求對象，新的表達形式，並帶來新的臺灣邊界。換個方式來說，臺灣意識這樣一個有邊界的空間想像，起因於一些作者在「活字印刷的社會條件下」發覺他有遍布全臺的新讀者，並以這些讀者為訴求書寫出新的文學，再被素昧平生的讀者觀看而共同想像為彼此的同胞。臺灣意識，確確實實就在作者的書寫之間形成，至於是否臺灣每一個人都參與這個想像，也就不是太重要的問題了。

這一段文學的歷史，是媒介技術構築社會空間的歷史，也是臺灣主體性發展的歷史。因為活字印刷串連作者與讀者，所以一種想像的、但真實有作用的共同體才得以形成，並持續縈繞在今天的我們周遭。

註釋

- 1 原生本質論以 Edward Shils（1957）、Clifford Geertz（1973）、Harold Issacs（1975）等人為代表；現代建構論以 Ernest Gellner（1983）、Benedict Anderson（1991）、Eric Hobsbawn（1983）等人為代表。相關論述比較可參考

- Craig Calhoun (1997, p. 30)。
- 2 史明 (1980)、王育德 (1993)、黃秀政 (1992)、李筱峰 (1995)、黃昭堂 (1996)、賴建國 (1997) 等論著，雖然政治立場各異，但都同意臺灣民主國的抵抗不具民族認同意涵。
 - 3 相關的評述有李廣均 (2004) 指摘王甫昌的「臺灣族群」在學術概念與其嘗試解釋的事實之間「不必然有同步關係」、陳翠蓮 (2008, 頁 17) 指摘「若不是日治中期以來臺灣人就形成了的集體認同，……何以能在戰後初期極短時間內自然形成、迅速凝聚全島性的反抗意識？」
 - 4 安德森所謂的民族主義四種類型，意即第一波克里奧民族主義、第二波歐洲民族主義、第三波官方民族主義及最後一波殖民地民族主義。臺灣接近克里奧民族主義的說法，可見安德森 2000 年來臺參加研討會之講稿報導 (Anderson, 2000/李巧雲、閻紀宇譯，2000 年 4 月 23 日)，另可參考方孝謙 (2001, 頁 81) 及張茂桂 (2005; Chang, 2003) 的討論。
 - 5 彌賽亞時間概念借用自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968)，強調人們因肉體共同在場 (co-presence) 而形塑的時間感。
 - 6 Balakrishnan 文中的「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was the message) 以過去式表達，限定於特定時空，有別於麥克魯漢「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的一般意涵。或許因為這個理由，Balakrishnan 未追問媒介的理論意義，反指安德森將民族想像的難題丟給「語言」，並列舉一國有多個語言、多國共用一個語言的反例來批駁安德森解釋力不足。邱承君 (2000) 的碩士論文亦有類似見解，都將想像共同體的解釋基礎轉為語言問題。本文則認為安德森的論點應回歸媒介問題，而非語言問題。
 - 7 這裡稱之生態環境 (ecology)，是呼應麥克魯漢及其師友 Harold Innis 始創的這一路思想脈絡，被 Neil Postman、Paul Levinson 及林文剛 (Casey Man Kong Lum) 等學者推動命名為媒介環境學 (media ecology; 林文剛, 2010)。

參考書目

- 工藤折平 (1933)。《臺灣出版警察の研究》。臺北：臺灣警察協會。
- 上沼八郎 (1975)。〈特殊研究二 台灣教育史〉，世界教育史研究會 (編)，《世界教育史大系 2 日本教育史 II》，頁 257-359, 377-388。日本東京：講談社。
- 王文顏 (1979)。《臺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甫昌 (2001)。〈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

- 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2): 145-208。
-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 王育德（1993）。《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自立晚報。
- 王詩琅（1980）。《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臺北：眾文圖書。
- 方孝謙（2001）。《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
- 丘逢甲（1960）。《嶺雲海日樓詩鈔（卷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70 種。
- 史明（1980）。《臺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蓬島文化。
- 吳介民（2004）。〈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李丁讚等（編），《公共領域在臺灣：困境與契機》，頁 299-355。臺北：桂冠。
- 吳叡人（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 127-218。
- 吳叡人譯（2004）。〈帝國／台灣〉，廖炳惠、黃英哲、吳介民、吳叡人（編）《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頁 1-20。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原書 Anderson, B. [2003, December]. *Empire/Taiwan*. keynote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imagining Taiwan: Nation, Ethnicity, and Narrative*. Taipei, Taiwan.）
- 辛廣偉（2000）。《臺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
- 汪益譯（1999）。《預知傳播紀事》。臺北：商務。（原書 McLuhan, E., & Zingrone, F. (Eds.) [1995]. *Essential McLuhan*.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李巧雲、閻紀宇譯（2000 年 4 月 23 日）。〈民族主義圖騰 橫貫古今東西〉，《中國時報》第 14 版。（原著 Anderson, B. [2000 年 4 月]。〈東方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新世紀世界文化體系之變遷與挑戰國際研討會」發言稿，臺北市。）
- 李承機（2003）。〈植民地新聞と《臺灣日日新報》論——「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はさま〉，《植民地文化研究：資料分析》，2: 169-181。
- 李承機（2004）。《臺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 李承機（2006）。〈從清治到日治時期的「紙虎」變遷史〉，柳書琴、邱貴芬（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頁 15-44。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 李筱峰（1995）。《一百年來臺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臺北：玉山社。
- 李廣均（2004）。〈內外想像與族群關係——評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灣社會學刊》，33: 249-261。

- 佐藤健二（1987）。《讀書空間の近代——方法としての柳田国男》。日本東京：弘文堂。
- 周定山著，施懿琳編（1996）。《周定山作品選集（上）》。彰化：彰縣文化。
- 林文剛（2010）。〈林文剛中文版序〉，《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頁 xi-xviii。臺北：巨流。
- 林淇養（2001）。《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臺北：麥田。
- 林淇養（2004）。〈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文軌〉，聯合報副刊（編），《臺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頁 21-47。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 邱承君（2000）。《想像《想像的共同體》——以《民報》社論為分析場域》。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前田愛（1973/2001）。《近代読者の成立》。日本東京：岩波。
- 施正鋒（1999）。〈臺灣意識的探索〉，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頁 58-97。臺北：海峽學術。
- 施敏輝（1988）。《注視島內一場「臺灣意識」的論戰》。臺北：前衛。
- 施景琛（1960）。《臺灣遊記／鯤瀛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89 種。
- 施瓊芳（1992）。《石蘭山館遺稿（上）＝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臺北：龍文。
- 若林正文（1987）。〈臺灣抗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與臺灣座標〉，《當代》，17: 40-50。
- 莫素微譯（2004）。《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科技。（原書河原功 [1998].《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日本東京：研文社。）
- 涂照彥（1993）。《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
- 張妙娟（2005）。《開啓心眼：《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臺南：人光。
- 張季琳譯（2004）。《臺灣文學這一百年》。臺北：麥田。（原書藤井省三 [1988].《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日本東京：東方書店。）
- 張茂桂（2005）。〈書評：《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臺灣民主季刊》，2(3): 155-164。
- 連橫（1960）。《臺灣詩乘卷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64 種。
- 連橫（1962）。《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
- 連橫（1963）。《雅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66 種。

- 連橫（1964）。《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08 種。
- 陳淑容（2000）。《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翠蓮（2008）。《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遠流。
- 游勝冠（2009）。《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群學。
- 黃石輝（1930 年 8 月 16 日）。〈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中島利郎（編）（2003），《一九三〇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1-6。高雄：春暉。
- 黃秀政（1987）。《『臺灣民報』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彰化：現代潮。
- 黃秀政（1992）。《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
- 黃昭堂（1996）。〈第二次大戰前「臺灣人意識」的探討〉，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編），《臺灣淪陷論文集》，頁 81-109。臺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黃純青、林熊祥主修（1983）。《臺灣省通志稿》。臺北：成文。
- 楊碧川（1997）。《臺灣歷史詞典》。臺北：前衛。
- 楊翠（1993）。《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
- 楊肇嘉（1968）。〈臺灣新民報小史〉，《楊肇嘉回憶錄（下冊）》，頁 407-440，臺北：三民。
- 葉榮鐘（1932 年 5 月）。〈「第三文學」提倡〉，《南音》，1(8)：無頁碼。
- 葉榮鐘（1987）。《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
- 鈴木清一郎（1937）。《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臺北：杉田書局。
- 劉建基譯（2003）。《關鍵詞：文化與社會學的詞彙》。臺北：巨流。（原書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Fontana）
- 廖為智譯（2006）。《臺灣民主國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的一斷章》。臺北：前衛。（原書：黃昭堂 [1970]。《台湾民主国の研究：台湾独立運動史の一断章》。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 蔡淵潔（1980）。《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原書 Ching, T. S. [2001].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蕭阿勤（1999）。〈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

- 學」爲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 1-51。
- 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6(2): 77-138。
- 蕭阿勤（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1): 181-239。
- 賴明弘（1934 年 4 月 29 日）。〈絕對反對建設臺灣話文摧翻一切邪說〉，中島利郎（編）（2003），《一九三〇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97-522。高雄：春暉。
- 賴建國（1997）。《臺灣主體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之影響》。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碩斌（2010）。《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臺北：群學。
- Anderson, B. (1983/1991).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and extended edition. London, UK: Verso.
- Balakrishnan, G. (1995).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New Left Review*, 211, 56-69.
- Band, E. (1972). *Barclay of Formosa*. Taipei, Taiwan: Cheng Wen Publishing.
- Benjamin, W. (1968).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pp. 253-264).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Bauman, Z.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UK: Polity.
- Calhoun, C. (1997).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ng, M. (2003). Understanding contending nationalist identities: Reading Ernest Gellner and Benedict Anderson from Taiwan. In S. J. Henders (Ed.), *Democratization and identity: Regimes and ethnic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67-93).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ellner, E. (1964).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 (1983).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 Hobsbawm &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 263-30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saacs, H. (1975).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Liao, P. H. (2006). Print Culture and the Emergent Public Sphere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In P. Liao & David D. Wang (Eds.),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History, culture, memory* (pp. 78-94).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Signet Books.
- McLuhan, M.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New York,

- NY: Bantam Books.
- Meisner, M.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 nationalism. In M. Mancall (Ed.), *Formosa today* (pp. 147-162). New York, NY: F. A. Praeger.
- Mendel, D. (1970). *The growth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rtre, J. P. (1998). *What is literature?* London, UK: Routledge.
- Shils, E. (1957).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130-146.
- Smith, A.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UK: B. Blackwell.
- Wogan, P. (200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considered: Is print-capitalism what we think it i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4), 403-418.
- Wu, R. (2003). *The Formosa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Typography and Taiwan Consciousness: The Social Mechanism of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Shuo-Bin Su*

ABSTRACT

This paper treats the “Taiwan consciousness” that emerged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as a kind of nationalism. Based on Benedict Anderson’s theory of “imagined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Marshall McLuhan’s theory of “media,”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aiwan consciousness could have been arise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ype-print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exts advocating literature in the newspaper *Taiwan Ming-Bao*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It is argued that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the “Taiwan people” was first claimed because the newspaper authors were aware of the capability of typeset print and then appealed to the non-specific masses, instead of familiar friends, as their readers. At the beginning, the term “Taiwan people” to oppose the Japanese was not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China. Afterwards, starting from the late 1920s, a clearer boundary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as drawn in the press-sponsored literature contests. That is to say,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concerning the “3.6 million people of our Taiwan” took shape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ccording to Anderson’s theoretical meaning. Thus, the

* Shuo-Bin S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development of typographic printing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key mechanism to the modernist construction of Taiwan consciousness.

Keywords: imagined community, nationalism, print capitalism, Taiwan consciousness, typography.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〇九期 2011 年 10 月